

知人论世与历史教学*

王振红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知人论世”一语出于《孟子》,本义是一种交友、修身和识人的思想与方法。后代学者往往立足于文学的视野,把“知人论世”发挥为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语文教学的方法;其实,“知人”与“论世”皆以获取“历史真实”为目标,更适合作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思想与方法。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语文教学;历史研究;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8-0081-03

Abstract: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quoted from the book of Mencius, is an idea and method of making friends, improving moral cultivation and judging others. Later scholars view it as the basic paradigm of studies of literary or the method of teaching of Chinese. In fact, it is more applicable in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history, because both knowing the author and knowing his time aim to obtain the historical truth.

Keywords: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literary studies; teaching of chinese; studies of history; teaching of history

一、知人论世的内涵

“知人论世”一词,出于《孟子》。《孟子·万章下》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在孟子看来,有德之士不但要广交天下有德之士,而且还要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尚论古之人);而与古人交朋友,一方面要通过诵读他们的诗文、著述,进而知道他们的为人;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处境。孟子论交友的这番言论,当是先秦社会重视交友之风气的产物。管仲与鲍叔牙、伯牙与钟子期的友情,可谓孟子前后人们交友的典范。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重视交友,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朋友不但能够互相成就彼此的事业而且可以完善彼此的人格,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友不如己者”云云,无不展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交友的重视。

不仅如此,孔子还认识到朋友是“知人”的关键,《孔子家语》有这样一段对话,孔子说我死之后子夏会不断进步,而子贡则日益退步。曾子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孔子回答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交友,而子贡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接着,孔子解释说,如果不了解儿子怎样,看看他父亲就知道了;不了解一个人怎样,看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了;不了解君主怎样,看看他的使者就知道了;不了解一个地方怎样,看看它的物产就知道了。所谓:“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这就是孔子提出的“知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法。在孔子看来,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朋友是最为关键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荀子的继承与发扬。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据此,荀子指出一个人虽然有良好的天资,但也要有贤师的教导与良

友的相处:有良好的师友相处,就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与德行不好的人相处,日久也会变坏。故荀子亦云:“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可见,孟子前后的先秦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视朋友的风气,人们不仅“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而且通过一个人的朋友来鉴别其人品优劣,即“不知其人视其友”。

由上可见,孔子、荀子论交友的核心内容是“道德”,孟子亦是如此。实际上,《孟子·万章下》在阐述“知人论世”之前亦有论“交友”的言论,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很明显,孟子认为交朋友交的是品德,其“知人论世”之说也应该与这段话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要之,孟子“知人论世”之说与孔子、荀子以“道德”论交友的主张大体相同,其本义是一种交友、修身和识人的思想与方法。后来,“知人论世”逐渐超越了《孟子·万章下》的具体语境,其含义演变为: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

二、文学研究与语文教法视野下的知人论世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后世有学者将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与诵诗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主要针对《诗经》提出的,它是理解《诗》的方法以及指导读《诗》和用《诗》的方法。^[1]因此,不少学者尤其是中小学以及大学教师把“知人论世”看作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教学实践的方法,在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广泛运用。

从上文阐释可知,把《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教学方法并不符合孟子的原义。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曾说:“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诵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2]朱先生认为“知人论世”

*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史学史系列课程整合优化研究与实践”(2012jyxm267)。

作者简介:王振红(1980-),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之说为修身、交友之法,以及“诵诗”、“读书”与“论世”三者并列,这显然都是正确的;然而,“知人”当是三者的目的,与上述三者并非并列的关系。由此可以这么认为,孟子提出“知人论世”,本义并不是在讨论“诵诗”、“读书”与“论世”,这三者只是成人、交友的手段或方法。由此可见,后人把知人论世也看成理解《诗》的方法,尤其是把“知人论世”视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教学实践的方法,都只能视为是后人的发挥,而非孟子的原意。

当然,后世学者把知人论世视为文学研究方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诵诗”、“读书”与“知人”、“论世”之间确实有着深入的关系。吕艺先生明确指出把“知人论世”看作单纯的修身方法,与诵《诗》、读《书》没什么联系,又似乎不妥。他还引用清人吴淇之言说:“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诵其书,当尚论其人。”这就是说,一方面诵《诗》、读《书》是我们与古人交流、对话的媒介,也是我们知人论世的凭借;另一方面,“知人论世”原义虽不是“评论作品”的方法,其实也可以作为指导读《诗》和用《诗》的方法,仍属方法论范畴。^[1]关于这一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得更为简明,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在此,章学诚从古人所处时代与具体处境理解古人之文辞,显然把“知人论世”纳入了方法论或文学批评的范畴。郭英德先生更明确指出:“在孟子那里,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而‘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后人将目的转移到‘颂其诗,读其书’本身时,‘知人论世’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无论‘知人论世’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它所强调的都是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和一致性,并要求读者在这种联系与一致性中阅读和理解作品。在这一意义上,孟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2]当然,这个基本范式并非孟子的原意,而是后人合乎情理的发挥。

顺理成章,由于作品与作者及其所处社会处境具有一致性,作品与作者及其社会处境于是可以互通互解;因此,“知人论世”不仅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成为阅读、鉴赏、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在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散文诗词鉴赏、文言文阅读等教学实践更是如此。吴敏莉就认为比较视野下的知人论世有助于诗歌鉴赏,例如通过比较生平境遇,梳理诗情变化;通过比较诗人个性,把握诗风差异;通过比较时代差别,感受精神不同。^[3]这显然把作者的生平境遇、个性特点以及所处时代与作品融为一体了。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都“文如其人”,包含着虚构、想象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这就是说,以“知人论世”的教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是有局限的。不仅如此,语文教学对“知人论世”的运用带有极大的随意性,需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尊重优秀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普适性,不宜过分强调“知人论世”;尊重文学作品阅读的一般规律,避免先入为主式的“知人论世”;尊重学生的知识储备和阅读水平,在学生“读不懂”的前提下以“知人论世”为突破口;尊重文学阅读和人生体验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学生“读不透”的情况下避免揠苗助长式的“知人论世”。^[4]可见,作为教学方法的“知人论世”不可随意运用,而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作为历史教学思想与方法的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教学思想与方法,虽然在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但是在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领域

却应用得不多。实际上,作为教学思想与方法,“知人论世”更适合运用于历史教学。这是因为,无论是“知人”还是“论世”都需要从人物个性、时代背景等历史事实层面进行探究,而这些对于文学作品往往只是“外在因素”,文学作品的赏析(诸如分析“人物形象”、“情感世界”以及“艺术真实”等)则应该主要从文学自身的“内在理路”来探究。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叙事抒情散文,属于文学范畴,对其的解读必须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应厘清‘历史语境’与‘历史真实’,超出‘历史语境’进入‘历史真实’,就会把文学作品降低为生活实录。”所以,“解读《背影》应该在‘学生语境’‘文学语境’‘历史语境’中找到平衡点,特别是‘历史语境’,必须适而不过。”^[5]这就是说,“知人论世”在文学作品赏析中不仅是有限度的,而且还要平衡各种因素。

与文学研究或语文教学中“知人论世”需要兼顾“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有些不同,历史研究或历史教学往往以“知人论世”的思想与方法再现“历史真实”。因此,史学领域的“知人论世”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文献的选择、梳理、分析、建构以求接近“历史真实”。无疑,“知人论世”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具有思想理论的价值与方法论上的价值。

例如,《史记·李斯列传》塑造李斯这一历史人物,就成功运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从“知人”方面来看,司马迁用了两个典型性的小事揭示了李斯好利贪权、没有底线原则的人物个性。第一件小事是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曾看见厕所中老鼠又脏又瘦,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而粮仓中的老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李斯于是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在李斯看来,人的贤能与不肖在于他所在的位置,所以他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衣食无忧的“仓中鼠”,然而他一生也正如“仓中鼠”时刻身处险境而不自知。第二件小事李斯权势达到顶峰之时儿子皆娶秦公主,女儿则悉嫁秦公子,有一次儿子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文武百官都前来道贺,门庭若市,冠盖如云。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此时,李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限,他虽然意识到盛极必衰,但趋利的本性致使他无法停止追求权势的脚步,以致在腰斩行刑之前居然还与他的儿子说我们现在牵着黄狗到东门外追兔子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见,李斯至死都没有醒悟他为什么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司马迁对李斯一生参与的诸多大事未加详载,而对这两件小事不惜笔墨,正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李斯的个性。

另一方面,从“论世”角度来看司马迁亦把李斯的悲剧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而建构的:李斯处于战国晚期,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尚力、仁义陵迟,至战国群雄并起,权谋诡诈愈来愈甚。对此情形,《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道:“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彘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李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向荀子辞行说,当今是游士的天下,时不我待;一个人没有比穷困更卑贱的了,我不能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穷困之地,我要去游说秦王。李斯一生鄙视卑贱穷困、崇尚权谋诡诈,显然与

(下转 85 页)

四、第四层 学会专业做事,更要学会诚信做人

教书育人的两重含义:教书=育人教书+育人。习主席在“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老师,“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就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

我教学生做会计,也教学生做人,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会计是工具也是艺术,是把双刃剑,应用不好,会造成更大损失,以至于有人说现在的会计是“魔术”^[12]。因此前总理朱镕基对会计人员就提出明确要求: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总之,会计职业道德要求比一般职业高很多。

基于此,在教学学生会计专业知识的同时,更教学生诚信做人。首先,在每一个知识点中穿插会计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以帮助学生熟悉会计行为规范,如在学习资产要素“现金”、“银行存款”时,要教育学生自觉维护财经纪律,严格遵守银行结算制度,加强企业货币资产的管理,培养强烈的制度意识。在讲到负债要素“应交税费”时,针对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的各项税制要素,重点说明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时足额上交国家税收,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培养依法纳税的责任感。

其次,通过对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具体实例进行深入分析,使学生了解会计行为的失职给企业、国家带来的损失。我国每年发生的经济案件很多,几乎都与会计人员有关,着重加强会计法和财经纪律方面的教育,插入课程中,启发学生的自觉意识,并对其以后的会计行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第三,教学的形式(方式)也很重要,过于死板的说教缺乏说服力,所以,这些年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举身边的例子,讲经典哲理故事,尤其是往届毕业生的故

事或结合现场情形“现挂”。这样不但学生听的生动,更增强学生信服度,逐渐形成一种认识、意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金碑银碑不如学生的口碑,用心教书,一切总是为了学生好,毫无保留的传道授业解惑,做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高翠.会计教学中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思考[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2,27(3):63+67.
- [2]肖慎华.论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J].高等农业教育,2015(2):69-71.
- [3]桑迪欢,张大军.高校教师课堂活动话语中“叙事”理念的介入[J].江苏高教,2014(4):101-102.
- [4]曾明星,蔡国民,等.基于翻转课堂的研讨式教学模式及实施路径[J].高等农业教育,2015(1):76-81.
- [5]张胤,胡菲菲.回归实践、回归问题、回归主体—论探究式教学的本质、特征及实施模式[J].江苏高教,2013(4):67-70.
- [6]李曦涵.会计教学方法创新与学生能力培养探析[J].经济视角,2011(2):48-49.
- [7]崔柳.激趣促学会计教学法[J].科技教育,2006(12):113-114.
- [8]杨艳玲.谈实用会计教学法[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24(6):90-92.
- [9]孙晓玲.课堂教学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措施[J].江苏高教,2014(2):94-95.
- [10]薛金锋,李国杰,等.农业科技创新型人才素质结构与培育[J].高等农业教育,2013(12):117-120.
- [11]刘润进,李长友,等.大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及其评价体系的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15(1):61-65.
- [12]龚慧云.论会计教学改革中的职业道德教育[J].财会通讯.学术,2005(10):117-120.

(上接 82 页)

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无不争霸尚力、务在强兵并敌的此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使然,也可以说时代的悲剧。

由上可见,《史记·李斯列传》运用“知人论世”的思想与方法成功塑造了李斯这一人物形象。所以,如果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运用“知人论世”的思想与方法讲述李斯的一生,这不仅能让我们深入认识到李斯一生悲剧的个性因素而且还能深入社会背景探寻李斯个性形成的时代因由。重要的是,《史记·李斯列传》以“知人论世”塑造的李斯的人物形象,不仅有着坚实的文献史料的依据,而且采取了典型性叙事的方法,亦即,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选择最能体现人物个性且又集中展现时代精神的事件,从而将“知人”与“论世”有机融合为一体。当然,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以典型性事件来“知人论世”也是缺陷的:一者,相对于生活活泼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波澜壮阔的社会,史料文献永远是不全面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展现人物个性与时代精神(一斑窥豹)理论上易于操作,实则非常困难,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通人难以做到;二者,任何人物既有时代的一般性也有个体的独特性,在一般情况下个体的独特性与时代的一般性具有一致性,即个体的独特性能集中反映

时代的精神,如李斯崇尚权谋诡诈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诸侯征战的时代特征;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孔子、孟子处于春秋战国争逐于智谋气力之时依然汲汲于道德礼义,这种持风气的精神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就不一致。要之,史学领域的“知人论世”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搜集、选择文献史料的能力,而且要求研究者深入把握人物事件的独特性与时代精神的一般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吕艺.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1985(2).
- [2]朱自清.诗言志辨[M].开明书店,1947.
- [3]郭英德.中国文化研究[J].1998.
- [4]吴敏莉.比较视野下的知人论世诗歌教学[J].语文天地,2014(12).
- [5]钟明.文学作品教学中实践“知人论世”的基本原则[J].现代教育基础,2014(12).
- [6]卢娟.“知人论世”的运用误区及对策[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6).
- [7]杨建章.过度“历史语境”化的泥沼:以《背影》为例兼与王君、王林喜老师商榷[J].语文教学通讯,2014(29).